中華文明

CCTV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引 子（1）
- 引 子（2）
- 第一章 曙光初照（1）
- 第一章 曙光初照（2）
- 第一章 曙光初照（3）
- 第一章 曙光初照（4）
- 第一章 曙光初照（5）
- 第一章 曙光初照（6）
- 第一章 曙光初照（7）
- 第一章 曙光初照（8）
- 第一章 曙光初照（9）
- 第二章 青铜时代
- 第三章 礼乐颂歌（1）
- 第三章 礼乐颂歌（2）
- 第三章 礼乐颂歌（3）
- 第三章 礼乐颂歌（4）
- 第三章 礼乐颂歌（5）
- 第三章 礼乐颂歌（6）
- 第四章 理性辉煌（1）
- 第四章 理性辉煌（2）
- 第四章 理性辉煌（3）
- 第四章 理性辉煌（4）
- 第四章 理性辉煌（5）
- 第四章 理性辉煌（6）
- 第四章 理性辉煌（7）
- 第五章 长城内外（2）
- 第五章 长城内外（3）
- 第五章 长城内外（4）
- 第五章 长城内外（5）
- 第五章 长城内外（6）

- 第五章 长城内外（7）
- 第六章 七彩长虹

引子（1）

因为拍摄《中华文明》，笔者有幸参观和考察了中国大部分博物馆和古代文化遗址，但从未像对敦煌莫高窟那样魂牵梦绕，眷念万分，像被吸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那是文化的深渊，让人无法左右自己，不得不穿越时空，随着历史长河的惯性涡轮旋荡在古老的千年丝路上。在中国，就中华文明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文化遗产地能够和敦煌莫高窟比肩，只有她牵系欧亚，盛行千年，并且，她的精髓一直保存至今。

莫高窟的含义有两个：一为沙漠高处的佛窟，古代莫与漠通假，二为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保存至今的莫高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共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主要集中在南区。最早创建于公元366年，最晚为公元14世纪的元朝，历时一千多年；北窟区主要是僧侣修行与生活区，壁画、塑像少见，除个别洞窟安装了铝合金门窗外，基本保持自然原生状态，似有意留下的一段时空隧道，其中的密教洞窟更增强了这一区域的神秘性。

没有谁能够真正说得清楚莫高窟曾经有过多少座洞窟，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曾经又有多少座洞窟里有塑像和壁画，莫高窟的崖壁在千年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坍塌，不断地一些洞窟被洪水冲垮，不断地一些洞窟被流沙掩埋，一些洞窟内的壁画渐渐地失去了绚烂的色彩。一百年前，法国人伯希和在洞窟内拍摄的关于吐蕃赞普的画像，今天都已经无从寻觅，一尊尊断肢残躯的塑像对我们诉说着无情岁月给莫高窟带来的伤害。

历史上，敦煌莫高窟的尊崇地位是因为佛教而产生，如同今日我们进教堂是因为上帝，它塑像和壁画的艺术价值是其次的，莫高窟大量精美艺术品的留下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与古代不同，今天的敦煌莫高窟却是因为她在中国及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而赢得人们的景仰，人们进洞窟已经不是为了礼佛，也可能是我们过于强调美术手段和技

法，她真正的本源反而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再高明的技法也是形式，而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也许这就是涅磐重生后的敦煌。

敦煌曾被两汉、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吐蕃、归义军、沙州回鹘、西夏、宋、元、明、清统治过，这里有中原汉族也有西北少数民族，不管敦煌在哪个时期被哪个民族政权统辖过，在历史长河里，敦煌莫高窟依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把她放在中华文明的三个大历史阶段来解读，以中原王朝为主干，更便于普通读者对她的认识和理解，这三个阶段是隋唐之前，隋唐时期和宋元时期。敦煌莫高窟也是和中华文明的兴衰相伴，所谓“国强，她亦强，国衰，她亦衰”，如果把中华文明与莫高窟的发展、盛衰过程同时标注在中国历史坐标系中，它们在很多地方是重合的，相信敦煌莫高窟的兴衰历程对于今天中华文明的发展也会带来莫大的启示。

一、乱世清凉

古文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个叫乐的和尚行至鸣沙山麓，见对面三危山山上金光万道，似有千佛闪现，遂在鸣沙山崖壁上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修行，随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窟侧旁营建一窟，为莫高窟之滥觞，这一段历史由距乐和尚300多年之久唐时的人书写，而且刻石立碑在莫高窟的洞壁上，今天学者们已坚定不移地相信此段开窟历史了。传说佛教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到75年）梦见金色神人披着霞光，飞于殿前献瑞，便派使臣到大月氏求法并带回佛经42章，但这个传说不见可信文献记载，普遍的观点是，东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使臣伊存在长安讲授《浮屠经》。大月氏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西汉时期，张骞就曾出使大月氏，如果承认佛教是从西域沿丝路传来，那么相较中原地区而言，敦煌的佛教活动无疑来得更早。实际上，敦煌地区的佛教传播活动可能早在汉代就已经很热闹了，在敦煌

与瓜州两市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东汉初年的简牍中有这样的记载：“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敦煌的某个地名叫小浮屠里，古人称佛教徒为浮屠，浮屠也是佛塔的意思，这表明敦煌在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有对佛塔的称呼了，悬泉置离莫高窟亦不远，约60公里左右，而佛塔是从印度传来的，绕塔礼佛是一种修行方式，只有在宗教活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才会建塔，也可能是当时的人把佛教徒聚集的地方叫“小浮屠里”。西晋时期，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经翻译大师，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和其弟子竺法乘就在敦煌进行传教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早在乐和尚之前就已经有人在莫高窟开窟修行了，敦煌书法大师索靖（卒于303年）生前曾在莫高窟题壁号“仙岩”，可能乐的名气响亮些，或者说他开的窟比别人更大些，修行的时间更长些，慢慢地名声就传开了，否则300多年后的人怎么可能会把他的事迹记载得那么细呢？尽管如此，唐代人却没有告诉我们哪座洞窟是乐或法良开凿的，今天编号为第268组窟和第272窟是莫高窟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两座洞窟，所以有人按常理推断，既然是最早的洞窟，那就可能是乐和法良开凿的，但是这种推断难令人信服，加上编号为第275窟的，被称为北凉三窟。北凉是公元421年占领敦煌的，距乐开窟已经过去了55年，如何又把乐和法良开的窟划进了北凉？这又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如同这一时期的古代中国。

引子（2）

中华文明自秦汉400年辉煌后，从三国两晋开始，统一的国家形象逐渐黯淡，民众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逐渐明晰而传承下来的国家意识尚未彻底巩固，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国家意识跌入到了低谷。晋廷*、官员残暴，战祸连年，四方狼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汉族和其他民族矛盾尖锐，北部、西北和西南的匈奴、羯、鲜卑、羌及氐为主的少数民族纷纷举兵，史称五胡乱华。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北魏史学家取其中十六个国家来代表这段时期，称这时期为“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这种说法虽有为汉族统治者推脱责任之嫌，但当时国家之乱而且是战乱和无序，的确是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敦煌密切关联的西凉国和北凉国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西凉最初定都就在敦煌，由李于公元400年创建，敦煌算历史上第一次被当作了国都，也是最后一次，5年后，西凉迁都酒泉。李是汉代大将军李广的16世孙，因此，西凉是地地道道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与五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连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都自称是李的直系后代，李唐王朝甚至还认祖追宗到了春秋末期的老子李耳。也可能正因为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丝路古道的西凉崇尚儒学，对东晋王朝称臣，一时敦煌名士云集，一些为躲避战乱的中原士民也大批移居西凉，敦煌成为河西儒学推广中心，佛家文化反而不被人提及了，在近期发现的西凉王李墓中，也不曾见到多少关于佛教文化的内容，但这并不表示李不喜欢佛教，只是区分主宾而已，李在没有建西凉国前就曾资助过法显和尚西出玉门求法，法显是最早奔西天取经的，比唐僧玄奘还要早200多年。

秦汉以后，“统一”成为所有王者追求的终极目标，西凉也不例外，为了统一河西，西凉攻打北凉，结果反被北凉所灭，而北凉却是个尊崇佛教的国家，由五胡之一的匈奴人沮渠蒙逊在公元401年所建，比西凉晚一年，学者们研究，今天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沮渠蒙逊所

建，另外，他在敦煌莫高窟发扬光大佛教的事迹，如同乐和尚一样，也是被唐朝人纪录下来的。今天，人们确认敦煌莫高窟崖面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洞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北凉三窟”。既然乐的时代离北凉国占领敦煌相距半个多世纪，如果是根据壁画和塑像来确认268、272号窟属于北凉，那它们就不一定是乐建造的了，就像我们虽然相信司马迁关于黄帝的记载，但是我们很难把考古发现中的哪具尸骨贴上黄帝的标签，更何况乐开窟也不一定绘有壁画或造佛像，也许仅是找一处清静场所修行，如同莫高窟众多的小型禅窟一样，再说，第268和第272号窟的体量也不算太小，以乐一人之力恐怕也难短期所能为，所以，唐人所谓的“乐开窟”的记载，可能是作者找到了一个佛教在敦煌莫高窟立足并用以书写历史的最好的理由，至少它说明开窟的和尚是来自中国本土的，这就为莫高窟最初的建造者定了性，因为乐的时代，

第一章 曙光初照（1）

公元前91年，中国汉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太史公书》，他讲述的中国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的。然而它仅仅是一个梦一般的传说吗？有没有证据表明黄帝和他的人民确实存在过？

这个地方叫仰韶村，座落在黄河南岸，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通向已经被废弃的村庄，那些残垣断壁很快将彻底地消失，但是，“仰韶”这个名字将会被永远地保存下来。

最初的线索是由一位欧洲人发现的，他叫安特生，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

1921年，安特生第二次来到仰韶村，目的是为了调查脊椎动物化石，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注意到远古的人群在仰韶村给我们留下的通行标志，那些随处可见的灰土层和众多的袋形窖穴。安特生在厚厚的灰土层里挖出了一堆石器和陶片。这些红底上描绘着黑色图案的彩色陶片难道是史前遗物吗？安特生的心里充满着疑惑和不解。之后，安特生又在黄河南岸发现了其他几处史前遗址，他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把“仰韶文化”与来自中亚及欧洲的彩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纹饰上有着某种相似性，因此他猜想：这些彩陶文化可能源出于同一个地方，但究竟是从中国传到西方还是从西方传到中国呢？安特生当时认为，仰韶文化应该是从西方传播来的。

难道中国文化真的是从西方传播来的吗？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东部的齐鲁地区，力图探寻出新的不同于西部地区的古老文化，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根是扎在本土的。

1928年，27岁的吴金鼎登上一处高高的土城墙，这个地方叫龙山镇。陪同告诉他，此地叫做“鹅鸭城”。养鹅养鸭何须有城？他怀疑“一部古代史迹深藏在黄土垄中”，果然，在断崖上的灰土层中他找到了像是抹了一层油似的黑色陶片。随后，由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先

生分别带队，先后两次进行了发掘。他们发现的黑陶文化，后来叫“龙山文化”，完全不同于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这一重大发现，动摇了几乎成为定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两次发掘成果，于1934年编成《城子崖》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

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大量精细的黑陶，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有黑陶的史前文化都叫做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高超的制陶技艺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其中有一种黑陶杯，重量不到50克，器壁最厚处1毫米，最薄处仅毫米，比鸡蛋壳还要薄，人们叫它蛋壳陶。即便是现代的制陶技师，要想仿制出类似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龙山文化距今4600年到4000年左右，它的根又追溯到哪里呢?

1959年中国京浦铁路复线工程启动的同时，也启开了100多座大汶口人的墓葬，那些远古的灵魂已静静地在这片土地上躺了6000多年，现在，他们的沉默被打破了……

人们惊异地发现，从6500年前开始，大汶口人以泰山为中心区域，创造了灿烂的中国东方古文化，被称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人的墓葬充分显示，在距今5700年左右，一夫一妻式的家庭正在建立，他们死后被埋在了一起。氏族内的人人平等制度已不复存在，大量的精美陶器和其他陪葬品出现在富人的墓葬里，而穷人死后仅有几件粗糙的陶器陪伴。在大汶口人的墓葬中有一种特殊的随葬品，它的外形象一枚炮弹，具有爆炸性的不是它的用途，而是刻在它上面的符号，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最初的文字，其中一个字的含义是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

第一章 曙光初照（2）

以泰山为中心的古代东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文化区域，与仰韶文化的特征并不相同，那么仰韶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

传说华夏族的首领黄帝和他的另一位氏族兄弟炎帝的部落都是起源于中国西部的渭水流域，在华山脚下，人们终于找到了仰韶文化最初的源头。

西部的华山和东部的泰山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也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它们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6700年前，仰韶人的一支选择了华山脚下一片肥沃的土地生存下来，今天这个地方叫半坡。

1954年，半坡人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这是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伊甸园。一条宽8米，深近6米的大壕沟仿佛把半坡人装进了一个最安全的城堡。

这是一处典型的聚落遗址，在当时的渭河流域可能分布着很多这样的氏族聚落，他们过着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生活。大部分聚落有100多所房子，人口在500人左右。他们种植农作物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米。

人们发现，早在8000年前，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古代先民们就把狗尾草驯化成了粮食作物粟，这是一项充满着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伟大发明。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是骨制或石制的。他们用石铲翻地，用石刀收割，最后在石杵上加工脱粒。

他们还捕鱼、狩猎，然后又把这些生活绘制在他们的彩陶作品中，其中的一位画家还把他的绘画工具石砚留了下来，在它的里面还残留着红色的颜料。

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独特的器物，把它放入水中，它的上半部会自动倾倒，当水增多时，瓶的下半部会逐渐下沉，直到水满而直立

起来，这种精巧的设计就像打水的半坡少女，透着天然的灵气，实际上，半坡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利用了重心与浮体稳定性关系的科学原理。

仰韶文化跨越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到5000年，分布的中心范围主要在渭河流域、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而这个位置恰恰与传说中黄帝的发祥地相吻合。

仰韶文化的一支曾沿着黄河东岸的汾河北上，在今天河北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与强大的红山文化碰撞并融合到了一起。

红山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赤峰市，早从1908年开始，中外考古学者就围绕着红山附近的古代遗存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它命名为“红山文化”。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发现了牛河梁积石冢，它距今5500年到5000年。积石冢的意思就是在墓上堆积石头，这正是红山文化独特的墓葬形制。

掀开厚重的石板，拂去历史的尘埃，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吗?

大片的墓葬被揭开了，石棺里的随葬品中没有陶器和其他物品，只有玉器，看来这里曾生活着一群尊崇玉的人。让墓主人灵魂不灭的是玉雕龙，它仿佛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玉雕龙被墓主人贴在胸前，它们在向我们传递着远古神灵的气息，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神秘的王国。

这是一片由石头构筑的世界，红山人把它们建在山顶上，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死去的祖先接近天国。这些石头在15公里外才有，它是靠人工一块一块地搬运来的。究竟是谁能调动大量的人力来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这处积石冢是方型的，近1米高的石砌台阶忠实地护卫着冢内的中心大墓，它应该是一座王陵。

第一章 曙光初照（3）

方形的积石冢旁边是一处砾石筑起的三环石坛，奇怪的是，它外环的直径正好是内环直径的两倍，可能是来自于红山人对冬至与夏至时的太阳运行轨迹和运行速度的观察，应该反映了5000年前中国天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每层石环的内侧都有大量破碎的陶片。现在我们把这些陶片复原，看看是什么：是桶形器。它上下贯通，毫无实用价值，显然是基于一种沟通天地的宗教观念。

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大片积石冢原来是祭坛，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原始祭坛，它东西长150米，南北宽80米。三环石坛是祭天的，而方形积石冢是祭地的，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中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天坛和地坛！

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死去的人建造了石棺，而活着的人又居住在哪里呢？考古工作者在山林里找到了一些大型泥塑的残骸和熊的下颌骨。根据这些泥塑残件的比例判断，最高的一尊泥塑像竟达5米以上。这些修长的手指、圆润的肩膀和*的乳房残件表明，她们是一群神秘的女人，令人震撼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祥的老祖母，难道我们看到的是5000年前的祖先形象吗？

人们相信，这里曾经是神的居住地，那是一座庙，一座供奉着女神的庙！

毫无疑问，500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王国，是王国的统治者和他的人民营造了这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它包括了女神庙、祭坛和方圆50公里的13处积石冢！

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享受的是同一轮太阳，此时的长江流域也开始大步迈向文明时代！

6000年前，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就已经相当发达，他们的彩陶杯、彩陶碗上描绘着各种美丽的图案，独特的白陶

制作工艺创造了中国史前时期最精美的浅浮雕艺术。这个地区的居民早在一万年前就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并延续到了今天。

湖南省澧县的城头山是洞庭湖畔的一个偏僻的村庄，1996年，它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因为这里发现了一座古城。它高出地面5米，城内面积有万平方米，城墙的顶部最宽处有13米，而墙基的厚度竟达35米，再加上围绕着城墙外的30多米宽的护城河，我们简直不敢想象，6000年前的洞庭湖畔耸立着一座如此气势雄伟的古城！

城内的土地已经“涨”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是数千年人类生活物质和大自然的堆积，今天的人们在上面种植水稻来延续生命。那么，6000年前的人呢？当考古工作者挖走覆盖着古城的厚厚淤泥的时候，一处和现在一模一样的稻田显露出来。掰开一块泥土，人们仿佛会闻到一股稻谷的清香，那稻谷是6000年前种下的，事实上，洞庭湖地区稻谷栽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以前。

享受稻米的人们并不仅仅局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沿江而下，我们来到中国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它位于美丽富饶的宁绍平原。大约距今7000年前，有一群人来到了这里，他们才是河姆渡最早的居民。

1973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厚达4米的文化层中，河姆渡人完好无损地把他们的故事堆积到了今天。尽管已经时隔7000年，可当时的河姆渡人已经种植着大量的水稻，那金黄色的是稻谷，碧绿色的是稻叶，河姆渡人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昨天的邻居。

第一章 曙光初照（4）

如果把这里发掘的稻谷堆积换算成新鲜稻谷的话，有12万公斤，差不多够500个人吃一年。

可以想象，河姆渡人的村落里每天都弥漫着米饭的喷香，以至于煮糊了的锅巴至今还粘在这个陶釜上。

河姆渡人还饲养猪、牛等大型家畜，这有着宽大叶片的植物，很可能就是他们种植的蔬菜。

河姆渡人还创造了令人吃惊的艺术品，大海和在大海中戏浪的海鸟飞进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喜欢飞鸟、崇拜太阳。

看这件象牙雕，在光芒四射的太阳两旁各有一只昂首相望的鸟，也许中华民族最初的凤凰就是从这里飞起来的。

河姆渡人居住在高出地面的木头房子里，这是一种像鸟巢一样的干栏式建筑。在木桩上架设龙骨以承托楼板，上面再立柱、架梁、盖顶，就成了干栏式房屋，它最大的特点是防水防潮，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卯榫结构，以及具有很高工艺水准的地板拼合企口技术。卯榫结构与企口技术是中国木构建筑最基本的要素，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建筑技巧是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的石器时代发明的。

河姆渡人在此处生存了1700年之后，离开了这处家园。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灵魂与肉体都融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里，他们去了哪里？难道像鸟儿一样永远地飞走了？

5000年前的某一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厚重的葬礼，死者是一个古国的国王，他躺在精美的丝绸上。巫师把玉钺放在他的身旁，那是他掌握军权的象征；玉琮表明他具有通神的功能，他生前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巫师，大量的玉璧拥集在他的身上，那是他的财富；这一切都

是为了让他，在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与其说他们在举行葬礼，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举行一个为了国王永生不朽的仪式。

这是一群什么人？在创造最初的中华文明过程中，他们又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什么？

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湖泊与河流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织成了一张繁密的水网，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被人们誉为人间天堂，可是，考古工作者却让人们相信，在这片土地的下面还有一座天堂！

1936年，供职于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镇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并编著考古报告《良渚》。由于出现了大量的黑陶，人们认为这处遗址是由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因此也把它定名为龙山文化。直到1959年，它才被重新命名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到4100年左右，广泛地分布在太湖流域，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以及江苏省西部和北部地区。

中国的丝绸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而谁也没有想到，最早享用丝绸的却是良渚人。碳14测定这些麻和丝织品距今5000年左右，它表明良渚人已经驯养了家蚕并掌握了缫丝技术，他们织出的绢和现代的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历史记录也许还可以打破，因为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艺术中已经有了蚕的形象。

现在我们知道了，追求永生的是良渚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他们的尸体早已烂成了泥，永生不朽的是随着他们一起安葬的玉器。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挖开了余杭县一处长满了杂草的土堆。这个叫反山的地方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然后在吊板上仔细地清理墓内的遗物，一件件魅力四射的良渚古玉。他们用蒸馏水漂洗掉残存的灰泥，玉器露出了它原有的晶莹的光泽。

第一章 曙光初照（5）

良渚人曾经开创了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他们的文明在被遗忘了整整5000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它的外壁是方型的，中心部位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圆形直通孔。每个玉琮上都雕刻着繁简不一的图像，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图像不管是繁琐复杂，还是简单明了，都坚守着同样的造型，仿佛是良渚人的一种虔诚的信念。

这种神秘图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玉璧也是一种礼器，雕琢水平不如玉琮复杂和精致，它炫耀更多的似乎是玉石自身斑斓的色彩。

钺，最初是一种武器，演变成玉钺，就作为权力的象征，类似于权杖。这件玉钺的下角刻有一只小鸟，它的上角雕刻着一幅细致而又完整的神人兽面像。这种神人和兽面复合成的图案，正是良渚人所顶礼膜拜的神。这完整的神像只能受到一个人供奉，那就是良渚人的最高统治者——国王！

良渚的国王们培养了一大批制作玉器的工匠，但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他们制作玉器的工具。良渚玉器主要是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原料，这种矿物质被称为软玉，可它比钢铁还要坚硬。在没有金属的时代，良渚人究竟用什么办法刻划出如此繁缛而又纤细的花纹呢?

至今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份令人信服的答案。

良渚玉器有很多称得上是真正的微雕杰作，线条细到肉眼无法辨认，因为它在1毫米的宽度内竟刻有5根细线。人们想像不出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良渚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这是连接中国东南部地区的104国道，道路的一侧有座巨大的土台，土台附近的山，叫做瑶山，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小山的山头竟然被人工削平了，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一处经过精心设计的祭坛遗

址。在祭坛的周围，还有大量的良渚人墓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表明，他们都是贵族。

考古发掘表明，104国道一侧的长方形土台全部是由人工夯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至少需要1万个人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还有一位远古的英雄，名字叫蚩尤。传说蚩尤勇武善战，有兄弟81人，大概是指众多的部落结成的联盟，被称为东夷集团，他们活动地点主要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而黄帝和炎帝结成的部落联盟，被称为华夏集团，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考古发现表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越来越发展，大概在5000年前的时候，这两个文化碰撞与交汇在一起。最终，它导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都成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事实上，中华民族不仅仅是炎黄子孙，也是蚩尤的子孙，是所有不知名的祖先们共同的子孙。

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个英雄的故事就从那个时代开始流传下来，无数个传说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文明的曙光初照在中华大地上，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那是最早的中国！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第一章 曙光初照（6）

◎仰韶村

严文明：中国实际上是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一个在黄河流域，是两种小米，黍和粟的起源中心；那么另一个呢是稻谷，稻作农业的起源在长江流域。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和早期发展的中心。这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它相互是互补的，比如说，旱作农业歉收了，水田农业还可以补充；水田农业这边要是有洪水呀什么的歉收了，那边还有旱作农业补充，而且分布的面积非常大，基本上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也就是中国后来，中国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龙山镇

黑陶杯

◎蛋壳陶

◎大汶口人墓葬

◎仰韶村

◎半坡遗址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

◎仰韶文化半坡人渔具

◎仰韶文化半坡人农具

严文明：在五十年代，我们就在一些新石期时代遗址发现了粟、发现了黍，但是最震撼的一次是在河北武安慈山这个遗址，发现了几百个窖穴，这个窖穴都是藏粮食的。中国就成了黍和粟最早栽培的国家，和最早发展为旱地农业体系的第一个国家。一直到汉代以前，中国的黄河流域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黍和粟，那么中国北方的文明就是在这种农业的基础上产生的。

严文明：黄帝的时候，传说他做了这么些事，我们看看这个阶段的考古遗存，它有没有这些事情，确实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

黄帝的传说也不虚，而且后面既然我们中国人，都认为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或者我们是炎黄的子孙，炎黄的裔族，那么它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对于团结我们民族起了很好的凝聚作用。

◎牛河梁积石冢

◎玉雕龙

◎玉雕龙

◎兽面玉雕

李学勤：近年来我们更多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国家，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对于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起着很重要的贡献和作用。不仅是在黄河流域，我们看还有长江流域，还有甚至更南的地区，往北，你比方说，辽河流域也很重要，甚至于更北的地区，那么就是说呢，在这种不同的性质的古代文化它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后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桶形器

◎桶形器三维复原

◎牛河梁泥塑像

◎红山文化遗址

◎湖南城头山古城遗址

◎8000年前的稻米

◎河姆渡文化陶釜

◎河姆渡双凤朝阳象牙雕

◎河姆渡陶钵上野猪纹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严文明：这种城市的出现应该是文明化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我们过去都不敢想像。我们以前以为，是夏商周的时候才有

城，结果是在史前，在夏商周以前，比如城头山吧，城头山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有城了，也就是离现在6000多年了。

◎7000年前蚕形纹骨器

◎玉钺上的兽面雕像

◎玉琮

◎玉琮

◎玉璧

◎良渚玉器

◎良渚兽面纹冠形玉器

李学勤：应该说研究文明的起源，对于研究整个的中国国家民族的形成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学术上的意义，那么从文化上的意义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中国整个的传统文化它的发展方向，它的各方面特点，而这一点和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的华侨华裔，他们对民族的认同这方面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严文明：中国的这个文明，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整合的文明，就是由这些小的城邦或者国家，它慢慢融合兼并，越来越大。从政治层面上它是一个整合，从文化层面上也是一个整合，从经济层面上，它还是一种整合。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越滚越大，势力越来越强，那么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加速，稳健发展，一直到后来，没有中断。

第一章 曙光初照（7）

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那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洪水如同猛兽般吞噬了人们的生命和家园。在那场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出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大禹。他带领人民疏通河川，开导阻滞，治理了水患，最终让人民安居乐业。

近代科学已经证明，地球在冰川末期，随着气候转暖，曾经有过世界性的大洪水，那次大洪水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的远古记忆而流传在各种神话传说中，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是，大禹被明确地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和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禹因为治水受到了广泛地尊重，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最终建立了夏王朝，而夏王朝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国。

都城不仅是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探询远古文明的时候，许多震撼人心的考古发现都和都城有关。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带着几名助手，沿着古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区域进行考察，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他发现了很多陶器的碎片，直觉告诉他，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都城的重要遗址。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清理出两座大型宫殿基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近几年，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多座宫殿建筑基址。有些宫殿基址左右对称，并由前后相连的几进院落构成。

在一些中小型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器以及由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和玉钺。古文献记载，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集中各地的铜料铸了九鼎以象征国家范围。

人们在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件铜鼎，它是否就是禹铸的九鼎之一呢？换句话说，这些青铜器是夏朝人制造

的吗?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从夏朝进入到了商朝，据说，大禹铸的九鼎也传到了商朝。

商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东夷民族集团，后来他们和中原的华夏族融合到了一起。商人与夏人在文化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1983年的春天，在离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面积1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这座城建于3600多年前，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在夏都附近建立都城的目的是为了向当时的三千多个诸侯国显示，商王朝已经成为天下的中心。

黄河中游地区古代称为华夏，居天下之中，又称中原。随着夏朝的建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华夏中原为核心舞台展开了，中原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汇聚的大熔炉，铸就了华夏民族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商王朝又在偃师以东100公里处建造了规模更大的都城，今天称为郑州商城。

半个世纪前，考古工作者就试图彻底解开郑州商城的秘密。1989年底，郑州小双桥村的一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件商代的青铜构件，可能是装在宫殿大门前端的枕木上。那些石柱础的上面曾经有巨大的木柱，它撑起的应该是商王朝的宫殿。

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瓷器，说明商人已经懂得在陶器上施釉。

商人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兵器，以及生活和生产用具。郑州商城出土的一件大铜鼎高1米，重达86公斤，人们相信，这些大型的青铜礼器将会展示商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第一章 曙光初照（8）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代国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代灭亡，殷一直是商都，从汉代开始，被称为殷墟，但是，殷墟究竟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公元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挖一种被称为龙骨的动物骨头，并把这些骨头卖到了药店里，因为一堆龙骨远远比他们在一年里种的粮食更有价值，就这样，不知有多少龙骨被磨成了粉，当做中药吃掉了。直到1899年的秋天，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这些龙骨的真正价值，他叫王懿荣，是当时著名的古董收藏家和金石学家。在一次熬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龙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金文非常相似，他立刻到出售这种龙骨的中药店，把所有带字的龙骨都买了回来。经过仔细研究后，他断定，这些符号是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龙骨就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就这样，王懿荣成为发现和收藏商代甲骨的第一人。

但是，这些甲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贩子们一直秘而不宣。经过多年的明察暗访，当时的另一位金石学家罗振玉猜想，这些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可能是在河南安阳小屯。

1915年春天，罗振玉来到小屯考察，他认识到小屯不仅仅是出土甲骨的地方，而且是商代的都城，是2000多年前史书中所说的殷墟！

紧随罗振玉之后，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排列绝大多数都刻在甲骨卜辞中，从而证明了《史记》中有关殷商王朝的历史记述是惊人地准确。

殷墟的发现，意味着一扇紧闭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已被打开，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这里就是著名的殷墟，它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两岸。在254年中，殷墟共经历了八世12位国王，国王们居住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不断地被发现。目前仅在殷墟宫殿区的夯土建筑基址

就有70多座，与偃师商城及郑州商城的王室建筑相比，殷墟宫殿越来越高大雄伟，它们在炫耀着商人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目前发现的殷墟范围达30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的是殷商王朝时期的一条大道，它宽近10米，足够并排行驰四辆马车。今天，我们将沿着这条宽大的马路步入殷商王朝的殿堂。

把马和车结合在一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商代马车的结构复杂，工艺已经十分完善。对于商朝的王公贵族们而言，拥有马车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时尚。

这是个“王”字，在甲骨文的含义中，王是国家的统治者，“王”字是由“钺”字演变来的，钺，最初是一种实用的武器，形状像一把战斧，后来成为一种礼器。目前，在殷墟仅发现了十几件青铜钺，它表明，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它们。

商王朝的军队，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青铜武器，他们头戴铜盔，身披皮制铠甲。在商人墓中，出土的青铜武器有成千上万件，各式各样的青铜戈和锐利无比的青铜矛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几乎每个成年的男人都有可能随时成为勇猛的战士。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比起王陵来，它的规模并不算大，幸运的是这座墓从来没有被盗掘过。墓中的随葬品竟有数千件，仅青铜器就达468件，有些器形是以往从未见过的。当考古工作者把这些青铜器上的斑斑锈渍去掉后，铜器上的铭文清晰地显露出来，上面写着“司母辛”、“妇好”、“好”等等，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在甲骨卜辞中，也经常见到“妇好”这个名字，多达250多条！

第一章 曙光初照（9）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在殷墟发现的唯一的一座既能确定墓主身份，又有甲骨文记录的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

妇好生前曾参与过一系列国家大事，是有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也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她的发簪就有490多根，使她每天都以新的面容出现在商王武丁的面前。她墓中出土的玉器有755件，造型十分生动，有玉鸟、玉马、玉虎、玉龙、玉凤等等，说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驯养着很多宠物，包括大象、熊等大型动物，在殷墟发现的一座象坑里，小象的脖子上还系着一只铜铃。

距殷王室宫殿仅一公里的地方就是商王朝的铸铜作坊，它的面积达到了一万平方米。虽然有着数不清的工匠在这里工作，但只有国王一人控制着整个王朝的青铜器的产量、品种和规模。商代工匠们熟练地掌握着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用陶范铸造青铜的工艺，并使用了独特的组合陶范来铸造大型器物。工匠们把经过晾晒的泥土捣碎，与掺入含有大量石英矿的细小砂子搅拌、揉搓，然后在泥块上雕刻种种纹饰和图案，烘干后就成了陶模与陶范。

一个范只能用一次，因此，在殷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青铜器。当铜矿变成了铜液时，就可以浇铸铜器了，铜液盛在这种被称为将军盔的陶器里，有时它也被当做炼铜用的“坩锅”。类似这种小型的熔铜炉具在今天还一直被使用，与商人不同的是，今天的操作人员戴上了一层隔热的透明面具。铜液的温度高达1200℃以上，浇铸时，陶范被埋入到沙中，在顶端留下不同数量的浇口。

他们采用分铸法铸造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

要维持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用的矿石量也大得惊人，仅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就达1600多公斤，至少需要8吨以上的矿石，但在殷墟

的周围，我们并没有发现商人采矿和冶炼基地。那些冶铸用的矿石来自哪里呢?

这里盛开着一种名叫“海州香薷”的美丽小花，人们又叫它铜锈草，它只盛开在铜矿的地表层。这个地方距殷墟900多公里，今天属于江西省瑞昌市。一根残存的木桩在彻底腐朽前，向我们传递出了最后的信息，它原来是矿井的支架，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支起来的。这座矿山，是中国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矿冶遗址。而位于瑞昌西北面的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至今仍是中国六大铜基地之一。商朝人在这里既有露天的采矿场，也有通往地下的采矿巷道。他们把其中最美丽的闪耀着翠绿色光泽的孔雀石挑拣出来，然后用木滑车运送到地面上。商都铸造青铜器时所需的铜料，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来源于大冶铜绿山矿区。对于战略资源如此丰富的长江中游地区，商王当然会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控制。

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载，商王朝曾与远在西南的“蜀”发生过关联，“蜀”是今天四川省的简称，而古代的蜀国却像是裹在历史谜雾中的幻影。

这个地方叫三星堆，传说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所谓三星堆其实就是残存的古城墙，城墙上的夯土层清晰可辨。对于古蜀人来说，厚厚的城墙似乎是他们固守的最后的堡垒，今天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听到了有人在叩响这个王国的大门。

那是公元1986年的夏天，几个工人像往常一样，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坚硬的土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堆土里夹杂着破碎的陶片、骨渣，还有玉器……

很快，挖土烧砖的行为被阻止了，这一片曾属于古蜀国的土地被保护起来。在这个土堆的下面，3000多年前的一个神秘王国的大门正在徐徐打开。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没有比这种时刻更令人紧张的了，坑内的夯土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清除，奇

第二章 青铜时代

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持续了1500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

在中国发现的青铜器不管是数量、种类，还是精美程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与青铜器同样辉煌的还有商代殷墟甲骨文，它的被发现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大禹陵

乐黛云：大禹的最根本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一种依靠自己，自我牺牲，而造福于别人这样一种大爱的精神，当时洪水滔天的时候，别的民族的神话讲到洪水，多半是说某一个神给他一个指示，比如说诺亚方舟，神告诉他大水要来了，然后他

就造一个小船，躲在船里面，可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不是依靠神，也不是依靠别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艰苦奋斗，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礼”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以至于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没有一个翻译词能和中国的“礼”字内涵相对应。

那么，中华礼乐文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形成的呢?

现在让我们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再往前追溯1000年，那是古史中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尧舜时代。

这里是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从距今4600年前开始，陶寺文化延续了500年之久，和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几乎存在于同一个时期。

尽管陶寺已发掘了1300多座墓葬，但丰富的随葬品全部集中在几十座大、中型墓中，说明那是一个贫富不均、等级分明的时代。这些彩绘的陶器就是从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作为陪葬品，显示出墓主人的社会身份。陶寺遗址还出土了玉钺、玉璧和玉琮，这种礼器，我们曾经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见到过。

陶寺文化里也包含了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广大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成套的大型礼器和乐器在陶寺也出现了。鼍鼓和石磬是一种乐器，它们原本是被悬挂在厅堂上的，还有成套的酒器和食器，只有在举行祭祀活动时才会被使用。在中国古代的持续的祭祀活动中，礼乐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今天，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祀遗址。

2000年的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内蒙古赤峰市的城子山遗址进行调查。这个地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众多的石砌或土筑的城堡，它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遗址群。遗址的中心范围达平方

第三章 礼乐颂歌（1）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美德传承至今！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

李学勤：中国是礼乐之国，礼仪之邦，可以说，从中国文明开始萌芽形成时起，就带有这种以礼乐制度作为它特色的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所讲的礼仪实际上是非常之广泛，它体现了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种种特点，也体现了社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在这些方面说起来，和其他的国家，确实有一些很大的不同，我们中国所谓的礼仪和外国人一般讲的形式的礼，意义也不完全相同。

李学勤：有的墓葬里出了有些礼乐性质的器物，比方说，鼍鼓，就是用陶制成的一种鼓，那鼓很高，是个柱形的，上面用短吻鳄鱼皮蒙面的这样一种乐器，这种乐器，你可以看到它一定有礼仪的性质。再比方说，它出的陶盘，中间画了一条盘龙，那么龙这种动物它本身并不是自然界存在的，它是当时的人们的一种信仰、神话的一种具体物，带有很重要的信仰的意义。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看到礼仪的发展在当时不但是萌芽，而且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为商周时期高度发展的礼仪制度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山西陶寺出土的龙纹盘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彭林：在武王克商之前，这个周跟殷商国力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商是地处中原腹地一个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所以周人在它胜利之后甚至还说它自己是小邦周，这个商朝是大邦殷。商在经济上它非常发达，可是在精神领域里面它一片空白，那么我们从甲骨文里可以知道，它不问苍生，问鬼神，什么时候都要占卜。物质文化的发达，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引领，最后这个社会要走向灭亡。

第三章 礼乐颂歌（2）

◎武王伐纣牧野誓师

彭林：你比方说，他在那里提到，“毋于水鉴，当于民鉴”，就是你执政的这个贵族，你不要拿这个水当镜子，大家知道这个鉴嘛，以史为鉴，以铜为鉴。你要拿老百姓当镜子，以民为鉴，这就是以民为本啊，另外说，“天视自我民视”，老天它看到什么，就是我们人民看到什么，天就看到什么，“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种精神在2000多年前这个中国出现，我觉得非常伟大。

◎西周青铜钟上的铭文

彭林：这个道德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是很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我们前辈很聪明，他把德这种东西分解成了很多的德目，每一个德目都是可以操作的，比方，诚信啊，孝顺啊，那么你在实践这个礼的过程当中，你就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一个理性的人，从行为上言谈举止上来规范你，所以这个礼是修身的，比方见到老年人应该怎么样，见到长辈应该怎么样，见到老师应该怎么样，在人家家里出现不幸的事情，比方丧礼，你应该怎么样，那么使你始终能够想到自己的行为应该是理性的。

◎西周青铜五鼎四簋

◎西周时期的各种瓦

◎编钟演奏

李学勤：这个礼乐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要体现社会的层次的结构，你比方说，现在大家都说列鼎，这个鼎本来就是一个吃饭的工具，是一种烹煮的器物，拿它炖肉煮肉，可是天子就要用九鼎甚至加上三个陪鼎，所谓天子就要用12鼎，那天子为什么用12鼎，是不是能吃那么多，他也吃不了那么多，是表现了他这个社会地位。

彭林：我们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人的灵魂要上帝来管的，所以每天要祈祷，要做礼拜啊，

要忏悔啊，甚至要用基督的血来洗刷自己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因为在西方理论里面，人生下来是恶的。可是在我们东方文化不然，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文化，我们的灵魂要靠自己来管，而且要把它管好，怎么管？就是要靠道德来管。

王巍：以青铜容器为中心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个非常突出的是，这些青铜容器上往往有铭文，有文字，而且这个文字的内容非常丰富，当然多数是对自己祖先，对王的歌颂，但是，它记载了很多重要的史实。

◎陕西扶凤出土的铜盘

◎青铜八簋组

◎西周青铜盘刻284字铭文

◎陕西扶凤出土的铜盘

◎青铜簋盖上的铭文

王巍：祖先崇拜确实对中华民族的这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中华民族都把黄帝作为共同的人文始祖，当然，实际上真正是黄帝的直系子孙，人数是很有限的。首先它是华夏集团的祖先，实际上最后发展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它对于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稳定，或者对中华民族的凝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学勤：中国的礼乐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他要讲“和”，所谓“和而不同”。我们讲“和”，用“和”这个字，其实“和”这个字在中国最早用的时候就是用在礼乐里面。中国讲的这个“礼乐之教”，为什么要用礼乐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呢？是因为它可以带有一种“和”的这么一个观念。

王巍：距离周王朝统治中心千里之外的一些分封的诸侯国当中，出土的青铜器往往和周王朝的首都附近出土的相当一致，无论从纹饰到器形，应该说，它是周王朝分封制度所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化的一致性。

第三章 礼乐颂歌（3）

◎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大型建筑基址

◎西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

◎西周时期宗庙电脑复原

严文明：从夏代、商代开始就是讲礼。孔夫子讲，“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就是说夏商周的礼是相互继承的。那么，每一个朝代更换以后，可能对礼多少有点修改，有一点增加，所以中国的礼是有传统的，而这个礼表现在物质上呢，就是礼器，礼器的大部分是集中在青铜器上。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湖北随县

曾侯乙墓出土大型编钟

◎安特生在仰韶文化遗址考察

彭林：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礼，它可贵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营造一个和，我们人如果失去了礼，我们身上都是野性，这个人就是不和谐的。我们人跟人之间交往，古代是通过礼来尊重对方，然后获得对方对我的尊重。

◎西周时期宗庙电脑复原

◎城子山遗址电脑复原图

战马是将军梦想的翅膀，这群战马曾经随着主人东征西讨，立下过赫赫战功。但是今天，往日的风光已经不再。在齐国国君齐景公的墓葬里，殉葬的600匹战马静静地躺在周围，忠实地陪伴着春秋时期，齐国最后一位霸主的大墓。它们似乎还在聆听2700多年前，中原大地上传来的群雄争霸的战鼓声。

西周末年，各诸侯国的国君，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创建一个政治清明、社会有序的国家。华夏大地上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新大调整。这段大调整由公元前7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结束，整整550年。史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五个实力雄厚的国家逐渐脱颖而出，它们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吴国，史称“春秋五霸”。后来，“春秋五霸”又演变为“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调整中，中国的未来会在哪里呢？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大变革的历史舞台。

就在那个时代，古代中国开始进入思想与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的兴盛局面，作为百家争鸣的先驱者，一群被称为儒的人，开始活跃起来。

春秋末年的某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周朝首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求学，他叫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曾跟随很多老师学习各种学问和本领，对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怀有满腔的热情。青年孔子勤奋好学，熟读大量古代文献，注重身心品德的修养，常常为方圆百里的人们解答祭祀礼仪方面的各种问题。孔子坚定地认为：只有严格遵守西周时期制定的礼乐制度，才能持续地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他听说首都洛阳有一位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大学者，十分熟悉周王朝的礼、乐，决定去登门求教。

那位传说中的大学者就是时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他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吸引了众多的问学者。面对远道而来的孔子，老子热情地带着他考察各种宣教场所，体验祭祀典礼和礼仪活动。

孔子由衷地佩服老子，认为老子是云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回到鲁国，孔子对西周王朝的礼仪作了全面的整理，针对当时诸侯纷争的社会，他描绘了一幅自己心目中理想世界的蓝图：遵循着西周以来

的礼、乐精神，把以孝为先的和谐家庭做为社会基础，以德服人做为治国方略，协和万邦做为外交策略，用这种以“和”为核心的思维，来创造一个天道与人道整体和谐的大同社会，真正做到万众一人，天下一家！

第三章 礼乐颂歌（4）

从此，一个新的学派——儒家出现了，一种维护中国2000年来社会安定有序、生生不息的伟大思想即将诞生，以“和为贵”的中国历史舞台再次拉开了灿烂的序幕！

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孔子开始了向世人宣讲他政治主张的伟大行动——周游列国。

此时，孔子最钦佩的师长——老子也要远行了，与孔子不同的是，没人知道老子为什么要离开，更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这里叫函谷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地势险要，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进取关中，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当时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突然看到紫气东来，认为有高人路过，便出关相迎，果然见到长须如雪，道骨仙风的老子骑着青牛悠悠而来。尹喜把老子奉为上宾，彻夜长谈，向老子讨教问题并再三挽留这位慈祥的老者，他被老子自然无为的学说深深折服，在尹喜的再三恳求下，最终老子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在函谷关写下了关于“道”和“德”的5000字短文，然后出关，飘然西去，从此，这位百家之祖，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便消失了踪迹。

后来，人们把老子留下来的五千字称作《老子》，又叫《道德经》，把以老子为代表的这一派称为道德家，简称为道家，道家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道法自然。

在道家学派的历史长河中，与《道德经》同为根源性典籍的是《庄子》，他的作者是道家学派的继承人庄子，后世也称南华真人，庄子一向喜欢独来独往。楚王听说了庄子的贤明，便准备了厚礼请他去做官，却被庄子谢绝了，庄子认为到楚国做官是被当做一个祭祀品供奉起来，如同作茧自缚。与老子内敛，以退为进的风格完全不同，庄子个性张扬，追求精神上无拘无束的逍遥，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应该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一样，遨游天空，自由自在，这就是《庄

子》一书的开篇《逍遥游》。庄子认为，人，如果为短暂的名利而死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

庄子的哲学是一种艺术的哲学。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他的智慧。“人生如百驹过隙”、“化腐朽为神奇”等等也都或是演变或是直接来自《庄子》一书。

庄子看到人们创造了财富却又被物质所累，因此，他竭力主张，人应该回归自然，回到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个体生命的极大重视，它认为，生命的价值远比名利和物欲更为重要。庄子的思想继承于老子，后人把庄子的著作与老子的《道德经》一起列为道家经典，称为“老庄哲学”。

为了传播西周的礼乐文明，实现“仁者爱人”的政治理想。十多年来，孔子带着几十个弟子，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也就在那个时代，有一位社会声望与孔子不相上下的人物，也在积极地寻求国君们的支持，这位赫赫有名的智者叫墨子。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备受世人关注，他的“兼爱”与“非功”思想，迅速使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当时的“显学”。

墨子，名翟。他博学多才，擅长守城技术、工巧和制作。有一次，楚国在发明家公输般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征服宋国。墨子为了拯救宋国，从鲁国首府曲阜狂奔十昼夜，赶到楚王国首都，就是现在湖北钟祥西北的江陵城。曲阜到江陵，千山万水，盘旋弯曲，即使按照今天的公路距离计算，至少也有1000多公里。

第三章 礼乐颂歌（5）

在《墨子》一书里就记录了这段墨子智救宋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把墨子的勇敢和智慧生动地展示出来，也为当今世界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墨子看来，两个敌对的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走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守防御武器加以展示和进行攻防演练，并以此来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避免了流血和牺牲。

墨家学派崇尚夏朝大禹的刻苦自厉的精神，主张平等地爱一切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墨子的这种“非攻”思想表达了人们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艺术的学问也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些传授兵学和写作兵书的人被称为兵家。兵家承认战争的必要性，同时又反对滥用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当时，兵家对于各诸侯国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可能会导致国家的毁灭。兵家的代表人物叫孙子，他是齐国贵族的后裔，逃亡到了吴国，并献给了吴王《兵法》十三篇，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孙子兵法》。

公元前506年，吴王任命孙武为将军，统领吴国军队与楚国交兵，结果是五战五胜。后来人们把孙武称为兵圣。但是，《孙子兵法》究竟是不是孙武写的，人们争论了2000多年，直到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代墓葬，并发现了用竹简分别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法虽然同出一脉，却风格迥异，自此，一个争论千百年的历史疑团终于揭开，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而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与兵家不同，还有一个学派采取政治外交的方式，以高超的智慧、务实的态度、灵活的手法、雄辩的口才来筹谋一个理想社会，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战国群雄中，秦国逐渐强大，开始对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构成威胁。基于当时的国际情况，以张仪为代表的一派提出连横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主张从西到东，各国同时跟秦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多边和平关系。另一种是以苏秦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合纵对抗政策，主张从北到南，各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秦国如对某一国发动战争，各国同时出兵作战。

纵横家是以外交斗争为重点，以游说诸侯为主要方式的，一种注重实践的学派。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具有超凡的谈判艺术和游说的技能，是卓越的政治外交家，他最早去了秦国，但是秦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他就来到了东方六国。

苏秦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同时担任六国宰相的人。这的确是一个戏剧性的时代，它可以使一个平民，凭着自己的才华，在一夜之间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人物。纵横家以三寸之舌击退百万雄师，显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这是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中最早也是最特殊的一群外交家。他们的活动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言论都被保存在《战国策》中。

最终，秦国还是打破了各国合纵的策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源自于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国的延续和发展。

1975年冬天，当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墓葬时，奇迹出现了。木棺内放置着漆器、陶器、铜器以及粮食和瓜果，但是这些随葬品的价值比起墓主人身边的竹简来，实在有点微不足道。竹简上的记述表明，墓主人叫喜，他是秦国从事法律工作的小官吏。喜十分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他把秦帝国的法律和日常发生的案例恭恭敬敬地抄在竹简上，直到他死后，那些竹简还一直陪伴着他。

第三章 礼乐颂歌（6）

这1100多支竹简，记录着秦代法制建设的面貌。它让我们看到，因为法家巨子商鞅的到来，秦国从一个位于西部蛮荒地带、默默无闻的贫穷小国，翻天覆地地蜕变成为世人仰视的新国家。

在商鞅看来，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赏罚分明，任用贤才。“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表演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有时甚至会产生改写历史的巨大能量。在那诸侯纷争战乱不断的年代，它让秦国摆脱了旧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只用了19年时间，秦国就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一次变法，它的成功，预示着动荡了550年的社会结构大调整即将结束。

公元前484年，先后拜会了72位诸侯和数以百计朝野名人的孔子已68岁了。整整14年的奔波与壮志未酬，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仁政”、“德治”的理想。怀着传承古代贤明政治的使命和信念，如同不畏严寒的松柏，孔子继续追寻着他拯时救世的伟大理想。

据说，孔子有3000多弟子。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者有70多人。孔子认为，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竭力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教育体系的根本理念。他希望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进而使家庭和谐美满，社会诚信友爱，国家安定有序。

孔子的教育方式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他的教育方式前所未有，孔子还亲自整理和确定了古代典籍教材。经过孔子充分发掘整理的典籍有《诗经》、《书经》、《礼经》、《春秋》和《易经》。《易经》，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著作之一。它用一种卦像符号和今人很难读懂的爻辞记载下来，据说是周文王所写，是周文王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又叫《周易》。孔子为这部书作了十篇解释性的文章《易传》，第一个用哲学的思想对《易经》的经

文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对儒家的伦理精神和阴阳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经书，成了官方规定的必读书籍。到了宋代，朱熹又补充倡导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从此，“四书五经”成了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从修身养性到跻身仕途，一生都离不开的经典著作。

由清代康熙皇帝御笔亲书“万世师表”的匾额，挂在位于北京的孔庙，显现着后代帝王对这位圣哲先师的尊崇。今天，中国将在全世界各地建立200多所孔子学院，天下大同的思想被继续发扬光大。在孔子的引领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思想上最自觉的“百家争鸣”时代，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此后，群雄并起，人才辈出，持续了260年的战国时代也揭开了帷幕。

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社会结构大调整已经经历了400多年，如何在群雄中胜出，如何在一统天下后管理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了各国君王面前。作为当时大国之一的齐国积极作出回应，不失时机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创建了“稷下学宫”，广泛招揽天下的知识分子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齐国政府以“来者不拒，往者不追”的态度，奖励各家自由探讨学术，纵论天下大事，还根据各人的知识构成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衔及财物，一时学者云集，盛况空前。这些人被称为稷下先生。列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稷下学宫”里关注现实，议论世界，反思历史，探索未来。

儒家的孟子和荀子，曾是“稷下学宫”的风云人物。孟子在齐国住了十多年，继承了孔子的主要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认为“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治理国家必须以礼乐教化，不能用强制和暴力的手

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成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后世尊称孟子为亚圣。

孟子去世后不久，另一位儒家巨匠荀子来到“稷下学宫”。荀子曾经三次成为“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当时叫做“祭酒”。在他看来，社会阶层差异的存在，恰恰是社会和谐的保证。而政治清明，社会有序，仅仅靠“礼”也是不完善的，还要加上“法”的辅助以及“乐”的熏陶，荀子成为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

稷下学宫中还有以金、木、火、水、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解释世界的阴阳家学派，其代表人物邹衍也在那里讲过学，还有以采集民间传说议论，考察民情风俗的小说家，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农家，与以“诡辩”著称，注重逻辑问题的名家，以及典型的齐国本土文化杂家学派，另外像道家、墨家、兵家、法家等各种学术流派的继承者也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

在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大变革时代里，一群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为着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所展开的学术争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使中国文化从神秘的氛围中生出了清醒的理性主义，与上古的混沌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那个辉煌的时代，虽然已经远离我们2000多年，但是，那理性的光辉却一直照耀着中国大地，成为后来中华文明思想智慧的基础和源泉！

第四章 理性辉煌（1）

2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曾有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段学术争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长河开始奔流不息，流淌至今。

汤一介：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个时候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比方在希腊就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在印度就出现了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就出现了当时犹太教的先知，就是《旧约圣经》这一部分，那么在中国就出现了老子和孔子等等，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社会2000多年，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思想财富。

汤一介：儒这个字是很早的字，最早它是指一种对礼有专门了解的一个专业的人才，当时叫做术士，有术的人，相当于现在所谓专业的司仪一样，他是一种专业的职务。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楚国纪南城遗址考古勘探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

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汤一介：孔子认为大同社会，它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是一个选贤举能的社会，就是怎么样来作为统治者或作为领导者应该是贤能的人来做领导者，它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生活美好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就是你爱自己的亲人，那么同时也应该爱别人的亲人。

汤一介：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念等等，很可能是不同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做，就是我们尽管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和谐相处，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可避免冲突。

◎孔子石刻像

◎函谷关电脑复原

刘大钧：道家认为所有的事情，必须按照自然的原则和清静无为地让它进行自然的发展，不要人为地加以干预，不要人为地加以引导，不要人为地去给它规定一些方向，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就像做一锅鲜美的小鱼的鱼汤一样。

刘大钧：儒家怀抱的一种境界是"内圣而外王"，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立功、立言、立德"，"希贤，希圣，希天"，这是儒家作为一个读书人，非常高的一生的追求。而道家不是这样，道家追求内心的感受和那种享受，他非常注意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往往道家被用于养生。

第四章 理性辉煌（2）

武树臣：墨子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以后，紧急拜见楚王，为了劝阻楚王，墨子和公输般当着楚王的面，摆开了沙盘，在沙盘上演习攻防，公输般用他发明的云梯，用九种办法攻城，墨子就用他发明守城的器械，用九种办法来加以抵抗，最后公输般失败了，楚王终于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荆州古城

武树臣：墨家是代表劳动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派别，他们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主张勤劳致富，他们的理想，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平等相处，聪明智慧的人要启迪那些愚钝的人，地位高的人要同情和帮助地位低的人，这样来实现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互利，互助的这样一个和谐社会。

黄朴民：兵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这么一个学派，从战争开始它就同时出现了。那么我们今天老是说《孙子兵法》是中国第一部兵书，这个概念是错的。《孙子兵法》前面还有兵书，无非是没有留下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第一部兵书是《孙子兵法》。

黄朴民：它是用最少的语言，最精炼的语言，最精辟的文字把军事学的最主要的内涵都包含在里面了，而且他的观念很先进，它的方法很科学，它的思维很辩证，他用5000多字就把这些用兵甚至治国的道理都阐释清楚了，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军事理论价值，同时也有超时空借鉴意义的伟大兵书。

◎越王勾践剑铭文

◎越王勾践剑

楼宇烈：苏秦看到秦国强大起来以后，一定会吞并六国，所以他主张联合起来，来抵抗秦国的这样一个扩张，所以他到六国去，一个一个国家的去说服它，应该说最初他的说服还是相当地成功的，六个诸侯国都被他给说服了，而且都封他为宰相。

◎战国盟书玉片

武树臣：法家是重视法制的，法家想用明确的具体的妇孺皆知的这种法律语言，法律和法规来规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要求人人都守法，都严格以法办事，以法律的手段实行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法家的理想是铸造一个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一个法制社会。

◎湖北云梦睡虎地墓葬出土秦竹简

◎秦国铁剑

◎秦宫一号大墓发掘现场

◎带“商”字瓦当

汤一介：孔子回到鲁国来教学生，他希望能教出一批有学问，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来实现他的理想，他希望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论语》这部书主要都是他和他的学生的讨论，对话，告诉他的学生什么叫做仁爱，什么叫做礼。

汤一介：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有两套教育系统，一套是由政府来办的教育系统，就是官学；一套就是私人讲学，孔子他们开创的私人讲学，那么这种官学传统和私人讲学传统在中国一直是传下来的。

◎孔子圣迹图

◎孔子圣迹图

刘大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孔子在《易传》上，他用“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形容这种阳刚精神，用“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来形容这种阴柔的精神，而中华民族历来都具备有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又有厚德载物的这种宽厚包容精神，所以这两种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发展的道路上，有如它的母亲河黄河一样，带着这样一种精神，永远地向前。

楼宇烈：春秋战国时侯，这个时期里面学派的众多和杰出的代表人物的众多，所以人们用诸子百家来描述它，比较大的当然是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纵横家。

第四章 理性辉煌（3）

◎西周卦象刻符

◎山东孔庙石牌坊

◎安特生在仰韶文化遗址考察

汤一介：这个学宫的性质是国家建立起来的一个文化中心，可以说，它是把当时各个国家的有学问的人，都希望吸收到他的中心来，那么据说最盛的时候大概有上千人在这个中心里面讲学。

◎齐国临淄城模型复原

◎山东淄博

汤一介：所以以后各朝学术繁荣的情况底下都是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如果一个社会，假如它这个花园里头只有单一的一种花，我想那是不一定很美的，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花配合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花园。

楼宇烈：诸子百家到了汉代已经被归纳成六家了，而这六家又相互的结合，到最后统合成了儒道两家了，一直到后来佛教传进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格局基本确立了，那就是儒、释、道三家。

秦人的祖先居住在犬丘，位于今天甘肃省与陕西省的交界处，后来，秦将都城迁移到雍城，即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秦是在西部偏远地区成长壮大起来的，春秋时期，东方的诸侯们认为秦是不懂礼乐教化的戎狄，实际上并非如此，伴随着对周人礼乐文明的向往，秦人的宗庙里也悬挂着这些大型的青铜礼乐器。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所知的春秋时期最大型的墓葬，大墓中出土的石磬铭文记载，他们是黄帝的后代，属于华夏族。

秦国真正强大起来是在秦孝公任命卫鞅变法后，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

卫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后，贵族们世袭的特权被废除了，所有的赏罚都是以军功来决定的，极大地鼓舞了想建功立业的平民百姓。

以重农的政策来发展国家经济也是卫鞅变法的根本思想之一。秦律中规定，损坏借用的公物是要按价赔偿的，唯独借用的铁农具，因破旧不堪无法使用时，只需要写出书面报告即可免除赔偿。

在秦公一号大墓中就出土有多件铁铲和铁削，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秦国的农民就在使用铁农具。

鼓励农民垦荒耕种，使得秦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迅速增长。

由于粮食富足，秦国在全国各地到处设置粮仓，首都咸阳的一个粮仓就可装十万担粮食，相当于300多万公斤。

秦孝公把商地的15个邑封给了卫鞅，它位于今天陕西省丹凤县，从此卫鞅又叫商鞅，至今这些厚厚的夯土层中还能见到带“商”字的瓦当。

在卫鞅的主持下，秦国将国都迁移到了咸阳。咸阳城建在关中平原中心地带的黄土台塬上，前有泾水与渭水的交汇，背依大片沃野良田，最终成为统一后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座都城。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战国群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的军队更是英勇无敌，威震四方。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王朝，他自称为“始皇帝”。这个始皇帝所统治的疆域已经广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面对统一后的空前的大帝国，究竟如何统治和管理呢？群臣们纷纷提出建议，最终秦王朝废除了西周以来分封诸侯的制度，把全国分成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和里，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所有的地方主要军政官员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但官职不是世袭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提升或罢免。这种政治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典范，最后演变成近代以来的省县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第四章 理性辉煌（4）

由于疆域辽阔，少数民族在全国分布的地域范围很广，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上游以及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非常多，从长江下游到今天的广东、福建一带有百越人，云贵川一带有西南夷，广西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西汉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县叫做道，就是民族自治县，这个制度也是从秦朝开始的。

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形状、大小、轻重和单位都各不相同，全国统一后，秦王朝规定废除六国旧币，以原秦币为基础，统一制定新的货币。

与此同时，秦王朝还规定统一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标准器，在考古出土的一些秦权和量器上，人们发现刻有这一诏书的全文。

在交通上，实行车同轨，轨宽六尺，便于在大道上行驶。

汉字原本同源，在商和西周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国别和地域的差异，往往一个字会有不同的写法，秦王朝规定以秦国的字体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文字的统一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强大的秦帝国虽然远离了我们2000多年，但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地为我们展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被称为秦咸阳宫第一号的建筑遗址，就是一处由夯土筑起的三层高台建筑，经过电脑复原后十分地雄伟。

在宫殿遗址内不仅出土了巨大的雕刻着龙形图案的空心砖，还发现了迄今中国古代最早的宫殿建筑壁画。

1974年的春天，关中平原发生了严重的旱情，陕西省临潼县的一群农民挖了一个5米深的水井，然而那没有渗出一滴水的水井，却通往了2000多年前的神奇世界。

一个伟大的序幕拉开了，即将上演的是20世纪最为壮观的考古发现！

经过两年多的钻探、试掘，到1976年时，人们发现，这里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陵园中的一处大型兵马俑陪葬坑。

目前已发掘的秦始皇陪葬坑中的兵马俑，有步兵、车兵和骑兵，指挥这支军队的是那些打扮得与众不同的将军们，他们的等级区别在于穿的铠甲。

其中一件将军俑，他身上的花穗显示出他的军衔。他手中的利剑支撑起他那厚重的身躯，也许他正在猜测，谁将会首先向这个地下王国发起挑战呢?

目前已经探明的三个陶俑坑中，有陶质的兵马俑近8000件、木质的战车140多乘。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完全根据皇帝的命令，调动的凭证就是“虎符”，它一半在皇帝处，另一半在大将手中，两半合在一起，才可调动军队。

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军30万挺进北方，控制了阴山山脉西段及其山南的广阔平原。为了巩固国家的北部疆域，蒙恬将军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

秦王朝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天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内，长达5000多公里，是名符其实的万里长城。经过秦、汉和历代王朝的修筑，长城被称为世界奇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伟大的创造并不仅仅是万里长城，就在长城开工没多久，秦王朝又修筑了一条通往北部地区的“直道”。“直道”是比喻路线笔直，它南起云阳，即今天陕西省淳化县，北抵九原，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一半的路程修筑在崇山峻岭中，一半修筑在沙漠和草原上，长达7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家公路，这么巨大的工程，仅仅在两年半中就全程通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第四章 理性辉煌（5）

公元前220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主持修建了一条从咸阳通往河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弛道”，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弛道”是指飞速奔驰的国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5次大规模巡游天下，其中3次就是沿着弛道出函谷关，然后抵达东方和南方。

公元前209年的夏天，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死，终年50岁。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成为他不朽的丰碑！

秦时明月汉时关，长城内外是故乡。秦汉时代修筑的长城，被当作中原农耕社会的北部屏障，曾经起到缓冲北方各游牧群落袭扰的作用。但这并不牢靠，到了汉初，长城依然没有挡住塞外骑兵的马蹄。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刘邦对他刚刚建立的汉朝既满怀期待也忧心忡忡，因为他的王朝还远没有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就在这一年，刘邦在长安城的皇宫——未央宫刚刚建成。

这里就是汉长安城遗址，始建于公元前202年。那一年正是汉朝的开国纪元，刘邦将国都选定在渭水南岸，取名长安。

然而，这座大都市并不安全。来自北方草原的骑兵经常突入长城，其前锋部队甚至进逼到长安附近。当时的汉朝还相当虚弱，没有能力与强大的北方游牧群落正面对抗。公元前198年的冬天，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负有“和亲”使命的汉朝公主，离开都城长安，远嫁匈奴单于。这种和平外交国策，为国家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在史称“文景之治”的40年间，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真正实施了轻徭薄赋的国策，农民的田税实收仅三十税一，也就是3%多一点。民生复苏，国家开始变得富强起来。

汉景帝刘启，史称“文景之治”的一位好皇帝，这是他的陵墓——汉阳陵。汉景帝是汉朝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之一。然而在他的陵墓中，竟也聚积着大量的财富。

不少汉代皇陵的周围都有数量惊人的陪葬坑。仅在这个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的阳陵陵区中，陪葬坑就有157座。

从20世纪9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阳陵的部分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其结果令世人震惊。

仿佛整个物质世界在这里汇聚，从真实的粮食、车马、牲畜，到陶俑男仆女佣、骑士卫兵、猪狗牛羊，应有尽有，所有这些，都象征着财富和美满。

为数众多的男女俑引人瞩目。他们或许就是象征着皇帝生前的禁军、侍卫和侍女?

这些陶俑在下葬时应该都穿着丝绸衣服或皮质的铠甲。尽管衣物大多已经腐朽，还是不难想象他们昔日的风采。

汉代妇女服饰，有款有型，线条自然、流畅。

淑女们举止安祥，内心却流露出由衷的喜悦。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了，秦兵马俑都是毫无表情的冷面将士，而这些汉俑，个个面部表情放松，似乎对生活很满足。

马匹在古代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现在的坦克。汉文帝开始创办国家马政事业，到汉景帝末年大见成效，朝廷开设在西北地区的36所马苑已储备30万匹战马。汉朝终于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成为日后汉武帝积极防御的主要打击力量。

汉武帝曾经两次从中国西北地区寻求优良马种，一次是在敦煌附近，得到了一种称为神马的好马，另一次由李广利将军率领大军西征大宛，得到汗血宝马，之后，汉武帝非常高兴，专门做了一首《西极天马歌》表示庆祝和纪念。

第四章 理性辉煌（6）

就这样，“天马西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汉朝开拓疆域、联通东西的壮阔雄心的象征。

在都城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上，突起了11座西汉皇陵，东西逶迤50多公里。

其中，最高大的一座是汉武帝的茂陵，是仅次于秦始皇陵园的最大的陵墓之一。这些看似小山丘的陵墓，2000多年来无声地述说着西汉王朝的辉煌。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登位，继承了一个经“文景之治”而日趋强盛的国家，汉武帝几乎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他的王朝面对攻击的被动和软弱。汉朝建国100多年来，由于经常受到北方游牧部族军事力量的压迫和骚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汉王朝的政治地图，背面总是残缺破损和移动变化。随着国力强盛，汉朝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以维护国家疆域的稳定。

汉武帝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刘邦承继下来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刘邦期待的“猛士”终于出现了！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征，与北方游牧群落进行决定最终胜负的漠北会战。两路大军出塞千里之外，分别在今日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南和乌兰巴托以东大获全胜，霍去病的部队甚至追击其残部远至呼伦湖和贝加尔湖。

至此，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算真正巩固下来。

战败后的北方游牧群落，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其中南部的一支开始与汉王朝和解，并长期保持亲善。汉朝也在西北边陲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

那时候，长安城里许多新建的房屋，都镶上了这种刻有“千秋万岁”、“汉并天下”字样的瓦当。满街望去都是一片令人昂扬振奋的口号，犹如我们今天的节日标语。

汉朝所称的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西域的绿洲上，共有大小36个国家，最大的国家有8万人，最小的仅有6百多人。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历尽艰辛，13年后返回长安。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张骞建议，推动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并维护这条中西交通大道的安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丝绸之路”正式被纳入汉朝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战略选择。

张骞的报告中有今天的伊朗和印度及西亚各国。随后，汉朝也获得了当时中国丝绸出口最西面的目的地——罗马帝国的消息。

汉军击败匈奴，河西走廊被打通之后，西域36国归顺汉朝，汉朝开始在轮台等地驻军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各国进行有效的控制，它们彼此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盛世出现在西汉中叶。张骞通西域，史称“张骞凿空”，东西方的文化与经济交流随之展开，丝绸之路的繁华景象，经魏晋隋唐并一直持续到了元朝。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到了西汉中叶，这座都城几经扩建，规模空前宏大。宫殿群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此外另有160多个居民小区，汉时称“里”。

市场是城市生活的必须。长安城内有所谓“九市”，都设在由政府管理的东市和西市。这种城市内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代末年。

汉朝的长安已非常繁华、富有，街道宽阔，行人如梭，商业十分发达。

汉武帝即位6年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3700万，长安城里有25万人，若连同其都城的卫星城——七座陵邑，则人口超过了100万，与罗马并称为古代世界东西方两大都会。

第四章 理性辉煌（7）

乐舞百戏是汉代市井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融入多种外来艺术成分的乐舞和杂耍颇得豪门大户青睐，而民间则盛行说唱表演。

汉代财富之丰盛，令人难以想象。文献中记载着许多关于皇帝经常赏赐大量黄金的事例。从汉初到汉武帝即位的70多年间，国家政治安定，没有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财政年年盈余，民间也是人给家足。

这时的大汉王朝，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它不仅是人口最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在长安城未央宫中的天禄阁里，收藏着许多图书、档案，司马迁可能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公元前98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即后世所称的《史记》。

这部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将中国历史从遥远的黄帝时代说起，直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西汉百年历史。

总结秦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创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是那个时代许多文人学者的共同抱负。因为华夏民族的国家观念在这一百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更新，这个漫长的一体化进程，始于汉代，延续至今，源远流长。

这是一个追求国家理想的时代，是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建立并最终形成的时代。

汉代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传播汉文化的种子，确立从文字、法律、伦理道德直至风俗习惯的一整套汉文化规范，并融合各民族的智慧，求同存异，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

但是，地广民众，前所未有。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观念、理想来治理这个空前庞大的新国家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延续了2000年的“尊孔”从此开始了。

汉朝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一整套国家理想的创新与实践。

从刘邦到汉武帝之前，政治主导思想是黄老思想，它的特点是无为而后有为，随着国家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发达，汉武帝要变无为到有为。

对历史传说中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崇拜，代表着汉朝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天下赖以千秋万代的根基。它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公元前110年，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出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场面。汉武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中华民族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

秦始皇开创的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正是这个伟大而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文明古往今来的生生不息。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尽沧桑，也曾战乱分裂，但是不管危机多么深重，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体，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生机。

第五章 长城内外（2）

◎新疆出土汉织锦

◎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

◎秦陵出土铜车马

◎汉茂陵

王子今：汉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天子不能车君驷”，皇帝出来时拉车的四匹马，找不到毛色一样的，社会很贫困，“将相或乘牛车”，坐不起马车，那么到了汉武帝时代，经过文景两代70年的积累，这个时候养马业就非常好了，阡陌之间成群，朋友们聚会，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如果骑了一匹母马的话就会受到嘲笑的，大家都会看不起你。

◎汉阳陵从葬坑内的陶羊陶猪

◎咸阳景帝陵

◎汉阳陵遗址的排水系统

王子今：在人们的意识中间，在人们的精神中间，人们的这个文化理念中间也形成为一个，我们就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就是汉王朝的臣民，早期的国家意识也非常鲜明了。

孟凡人：他是把这个西域的信息反馈给汉朝政府，汉朝政府尤其汉武帝一看，西边还有那么大一块地方，物产那么丰富，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下决心要通西域，只有汉朝通西域以后，把现在新疆地区的交通线整合之后，他的力量才又到了现在的中亚地区。

◎“汉并天下”瓦当

◎茂陵石雕马踏匈奴

◎秦诏版

◎龟兹故城“皮郎墩”遗址

◎安特生在仰韶文化遗址考察

◎茂陵石雕卧牛

刘庆柱：钱很多，中央的财政积累很大，所以穿钱的绳子烂掉了，国家太仓里的粮食吃不完，腐烂掉了，我想至于百姓当中的这个生活富裕到什么程度，应该说是可想而知的。

张传玺：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历史观，所以《史记》这本书就能看出来，更发展的一部是《汉书》，班固写《汉书》，《汉书》里面有地理志，全国的中央在长安，全国多少郡？103个郡吧，多少个县？上千个县，从中央一直写到东海边，长江，黄河，一直到粤江，一直到海南岛，西南夷，一直到云南贵州，多少郡多少县都写了。

刘庆柱：以汉族为主体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它的形成过程和秦汉时代由王国到帝国，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

刘庆柱：中华文明这样的一个历史能够几千年延续下来，它的不变的DNA的存在是根本，这种不变的DNA是什么呢？我觉得从这个精神领域，就是它的一种，比如说在汉代确立的独尊儒术，就是儒家思想，尽管那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由于当时的学者，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来了，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变成一种国家的统治思想是在汉代确立下来的。

王子今：一种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因为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一个民族，能够凝聚在这样一个核心四周，凝聚在这样一个旗帜之下，凝聚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之内。

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阴历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绍兴郊外的兰亭，清澈的兰溪河畔列坐着41位峨冠博带的文人。他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原来，这是文人学士们按照千百年旧

俗，在水边举行祭祀，捎带着进行春游。席中50岁的王羲之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序。

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那篇序文就是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此书共28行，324字，在结构上，舒缓有致；在用笔上，每个字都不断地出现新的变化。全篇有7个“不”字，21个“之”字，个个富于个性、无一雷同，通篇看去完美无缺。

第五章 长城内外（3）

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觉醒和自觉的时代。王羲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的全面成熟，书法史上一个高峰诞生了。

公元303年，王羲之出生于琅琊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西晋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公元317年，中原士族在南京拥立司马睿为帝，史称东晋。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动荡中建立起来的王朝，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大家。

王羲之，字逸少，因为他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王氏家族是东晋望族，诗书满室，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深刻熏陶。成年之后，他又多次离家远游，遍访名山大川，临摹了无数名家名碑，书法造诣日加精湛。《晋书》记载，“王羲之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都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辞而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

正是这种真性情，使王羲之的书法没有一丝一毫的尘埃气，充分表现了他用自由自在的心灵感悟这个世界。这也正是晋代士族文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魏晋士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玄学为中心的清谈。所谓“清谈”，类似于现在的学术辩论会。饱学之士们挑选一个清幽的场所，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交锋。西晋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使中国回到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中。西晋的统治者，一度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力，加在老百姓身上的税赋，也有所减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是对《老子》、《庄子》、《周易》“三玄”思想的重新阐释。老庄旷达玄远、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活态度，给了晋人极大的启发。士人们在清谈中激烈地辩论，人怎样活才算快乐？物质的满足和心灵的解放哪一个更重要？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完美的

人格？他们思考后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而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

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魏晋时代，沿袭秦汉以来的中原文化脱胎换骨，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魏晋时代的每一个文化大家的思想里，都充溢着浓烈的玄学气息，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飘逸的魏晋风度。

公元1960年4月，江苏省文物考古队南京分队，在南京西善桥附近发掘一座南朝刘宋时代的砖室墓葬，发现了这幅竹林七贤大型摹印砖画，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七人，他们是清谈与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但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那就是认为活生生的生命不应该受伦理教条的拘束，而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在这幅砖画中，七位贤者或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他们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但是又比较注重内心的调养。

嵇康为七贤之首，他爱好音乐，如痴如狂，文献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40岁那年，嵇康被人陷害判为死罪，临死前，他不担心别的，只担心他的音乐，怕的是“广陵散从此绝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田园诗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了中国诗人笔下。

第五章 长城内外（4）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玄学的背景下，士人们首次发现了大自然的超然之美。许多人辞官归隐，钟情于自然山水之间，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29岁走上仕途，几经宦海沉浮。东晋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11月，陶渊明在最后一次出仕，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永远地回到了庐山脚下。只有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超越的意义。他在自己的陋室中展开纸笔，在大量的田园诗中，写下了千古名篇《归去来辞》：“田园将芜兮，胡不归”。

陶渊明不但抒发了自己回归田园的喜悦和轻松，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仅建立了一种新的诗体，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人格：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泛此忘彼物，远我达世情。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从陶渊明开始，表达超脱尘世，纵情山水的愿望，歌颂清新美丽，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成为中国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诗人和作家们不再把宣传教化、谋取功利作为文学的目标，他们的笔触转向了内心世界，由此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自然。陶渊明的不朽诗篇和伟大人格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这一名句，清晰地说明了“魏晋风度”对历代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魏晋时代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第一个“自觉时代”。

魏晋以前，中国书法经过了甲骨文、钟鼎文、秦篆和汉隶四个发展阶段，产生了李斯的《泰山刻石》、汉代《张迁碑》等书法名作。然而这些书体规范性过强，很难让人“率情任性”。魏晋时期行草和楷书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行草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书法家的手腕和胸怀。王羲之、王献之、王询等魏晋书法大家的作

品，下笔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意，可谓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从此，中国书法真正突破了工具范畴，而真正成为一种“任情恣性”的抒情方式。

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天下第一行书，成为后世所有中国书法家必须临摹的作品，二王开创的书风主宰了后世书坛近两千年。诸体书法，无论楷书、行书、草书，都是在王羲之书风的基础上向各个方面的延伸和拓展，后世的所有大书法家，都从王羲之这里汲取了丰厚的文化养料。

唐代的张旭临遍王氏法帖，在行草的基础上创立了狂草，把王羲之行草中的放达不拘推向了极致。苏轼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十分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厉、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他的笔下尚“意”而不尚“法”。师其意而不师其表，就是说不拘泥于外在形式，被公认为是书法艺术的更高层次。二王书法超尘脱俗，逸气满纸，学习者必须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才能得其神而不流于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继承了王羲之的*俊秀，洒脱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被公认为王羲之的嫡派传人。从魏晋到今天，“书不入晋，故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意思是说，学习书法如果不从晋人入手，就不能提高书法的品位，如果不遵从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

魏晋书法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精神和性格。“重神轻形，以神为上”，成为中国书法永恒的审美标准。

第五章 长城内外（5）

公元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发掘了一座北齐的墓葬，墓主人是北齐右丞相娄睿。娄睿墓出土的文物很多，但最为世人瞩目的是71幅壁画。这些壁画完全摆脱了秦汉以来墓葬壁画的刻板程式，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十分浓郁。这一匹骏马的目光，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那么炯炯有神。在表现技法上，则采用了写实主义的绘画手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品。

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彩陶、殷代青铜器上的花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但是在魏晋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署名的绘画作品。那时的绘画都是由无名画工们完成的，而绘画成为真正的艺术，这种自觉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

晋代人精神追求的多指向性，个性表达的充分自由，给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生活在东晋的顾恺之，一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矫揉造作之气。在纸笔间注入了自己的气质和灵魂。他作画，是要在画纸上书写自我，而不是格言和教条。他并不一味地追求形似，而更重传神。

老子称道为精，称道的妙用为神。庄子进一步将人心称为精，将心的妙用称为神。合而言之，则称为精神，魏晋的所谓精神，就是由此而来。《世说新语》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画眼睛。人问其故，顾恺之回答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意思是说，肢体的美丑，不是那么重要，画人物要想传神，关键在这个眼睛里头。

传世的顾恺之作品均为后世摹本。《女史箴图》是根据晋人张华的《女史箴》创作的，画中的女性人物身躯拉长，强调腰身转折与衣带飘举的美感，这种不具重量感的匀细线描，后来被称为春蚕吐丝。《洛神赋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画面上，曹植痴情凝视、

怅然若失，宓妃含情默默、依依不舍的悲怆心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于心。从顾恺之开始，“传神”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成为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

从汉末到魏晋的400年间，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奇迹般地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进入了全新的唯美主义境界。士族文人们所热衷的玄学，使他们在寄情自然山水之间，在清谈思辨、饮酒作赋之时，得到了意外的艺术收获。士人们主动追寻自然，赋予自然人格化，进而在自然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中国的山水画，并非要模仿某一山，某一水，而是以许多山水为创作的素材，艺术家要创造的是为自己的精神所需要的新的山水。从魏晋时代起，中国的绘画艺术从写物层次升华到了写心层次，“写意重于写实”，“神似重于形似”的艺术原则开始走向成熟。

五代两宋时期是山水画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画家，以真实的自然山水为生活依据，描绘出北方重峦峻岭的万千气象与南方逶迤连绵的秀丽风光。宋代山水画中最具创造性的画法是米芾、米友仁父子所创造的米氏云山。米芾是著名书法家，对笔墨的抽象美有着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于是以水墨挥洒点染表现他对江南山水的印象和感受。不求形似而求神韵。元代以赵孟为代表的文人学士特别推崇信奉玄学的魏晋时代，对自然无为的生活状态极度向往，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效法老庄的隐逸，艺术上也极力从魏晋吸收营养。“闲咏渊明诗，静学右军字”，他们的山水画无论构图还是笔墨都达到了虚中实，实中虚的境界，力图把自我和自然合而为一。

第五章 长城内外（6）

魏晋时期的艺术是崇尚“自然”的艺术，它创造了东方式的艺术思想，从而产生出“气韵”、“形神”等美学概念。

悠远的驼铃声，回荡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了遥远的中亚以及罗马。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不同的文明，开始在这里交汇和融合。从晋代开始，一批又一批西域僧人进入中原，传播佛法，同时也传来了石窟建筑。随着佛法东流，石窟建筑也沿着佛教传播的途径，先后出现在中国的新疆、西北、中原和南方。

公元366年的一个黄昏，一位叫乐僔的僧人，手持锡杖，西游来到敦煌，快走到鸣沙山的时候，一抬头，只见对面的崖壁上一派金光耀眼，霞光万道，闪烁的光芒中，仿佛有千万身佛像向他显现。

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形成的幻像，导致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大一座艺术宝库的诞生。乐■决定不再西游东行，他雇工匠在鸣沙山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拜佛修行。这便是莫高窟第一窟的缘起。

莫高窟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建筑、塑像和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上。莫高窟的壁画造型简练、线条奔放、用色大胆。那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大胆的想像，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这些西北画师对理想天国动情的描绘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不受礼教束缚的*不拘的艺术激情，北方民族浑厚雄健的气魄跃然壁上。

中国文化艺术史自古以来就有北雄南秀之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中国分为南北两大地域，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北雄南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极端，使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特征在强烈对比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凸现。探究其原因，是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一次民族大融合。

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趁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儿复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公元398年，拓跋■又把都城迁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第二年拓跋■称帝，史称北魏。

公元2003年冬天，考古学家们在大同城北的操场城街，发现了北魏的建筑遗址，这些残存的遗迹，让我们找到了复原北魏王朝历史的重要线索。北魏的几代皇帝用武力统一了北方后，深切的体会到文治的重要性。他们大量任用汉人士族，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礼仪制度，把北魏政权逐步引导到封建化的道路上。

数以百计的北方少数民族，融入到了汉族之中。刚毅雄健的游牧文明，给本来就浑雄厚重的中原文化注入了草原的粗犷剽悍之气。因此，中原文化也于此时别开生面，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

最能体现北方民族文化个性的，是大量的石窟造像。在莫高窟开始建造后的一百年间，河西地区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石窟，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万佛峡的榆林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甘肃永靖县的柄灵寺石窟，甘肃张掖的马蹄寺石窟。

如此众多的石窟，包括莫高窟，谁都没有拔得那个时代石窟艺术的头筹。它们建成后不久，在遥远的河东地区，北魏皇帝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这座石窟，无可争议地创造了石窟艺术的绝世辉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其盛况空前。

第五章 长城内外（7）

云冈石窟选址于山西大同郊外武周山北崖，这里是一片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所在。为开凿云冈石窟，北魏几乎耗尽了全国的物力。据史书记载，开凿石窟时，北魏帝国征发天下工匠数万人，每天吃掉的粮食和盐巴高达15000斗，就连做佐料的辣椒，每天都要消耗5斗。经过30多年日以继夜的开凿，云冈石窟中代表性的昙曜五窟终于建成。这些佛像都异常高大硕壮。最高的是19号窟的主佛，高17米，连最矮的16号窟佛像也高达米。佛的威严神秘和雄伟气魄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大体大面、平直刀法的直接运用，以及造像线条的舒缓、洗练，形成了云冈石窟早期雕像雄壮、粗犷的美学风范。这些威武健壮的佛像，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帝王的雄心壮志，象征着鲜卑人的豪迈气概，令后人惊叹不已。鲁迅将“云冈的丈八佛像”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耸立在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

公元5世纪末，北魏王朝的政权转移到一个少年手中，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北魏政权极力推行改革政策，促进了北魏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公元494年，北魏把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并开始用几乎占全国税赋一半的财力兴建了洛阳龙门石窟。这座花了30年时间营造起来的石窟，其主体洞窟是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

我们无法知道开凿龙门石窟和开凿云冈石窟的是不是同一批工匠，看上去，这些佛像从外表到气质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龙门石窟是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产物，此时的造像充分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营养，在印度佛教艺术的重表现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艺术重形似的美学追求。怎么样塑造佛的面部表情，一定让这些工匠们费了不少心思。佛的面容，既要庄严肃穆，让人产生顶礼膜拜之心，但又不能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搬到洛阳之后，佛像平添

了几分人间气息。他们开始穿上了南方的褒衣博带，面容中消减了过度的威严，脸上的微笑使它们看上去不像神，而更像生活中的人。

经过南北朝文化的交融，唐代匠人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建于唐代的龙门奉先寺造像，是龙门石窟造像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处。造像主尊为坐式，头高4米，耳长米，波状发髻，眉高而长，目光凝视前下方，口角微含笑意，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又有女性的温柔之美，是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被誉为中国雕塑史上伟大的经典。

清代乾隆年间的某一个下午，书法家黄易来到龙门石窟，不经意踱到了著名的古阳洞。瞻仰过雄伟的佛像之后，他举目四顾，在昏黄的光线中，他发现佛像旁边似乎刻着几行文字。他走近一些，原来这是一幅《造像记》。这些造像记是用来记录造像者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的。这些刻字，很显然都是佛像的附属品，它们处于不显眼的位置，占据小得可怜的面积。可以想象，这是匠人们经过千辛万苦完成造像工程后，擦擦汗水，喘口气，放松了精神，带着大功告成的喜悦和成功感，在旁边随手凿上的那么几个字。然而，正是这不经意间刻上的文字，让黄易震惊无比。黄易发现，正因为是无名刻工随手刻就，所以他们采取了最为简洁粗犷的“直刀法”，使刻出来的字用笔方折峻整，梭角分明，刀痕明显，锋芒毕露。这种笔法本来是对士大夫书法技巧和法则的生硬破坏，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纯任自然，绝无做作，把旧有的规矩章法全都打破，反而使文字天然质朴，灵气飞动。这种看似笨拙、生猛的字体里透出的是磅礴的内在力量。黄易大喜过望，他立刻命人把这幅字拓制下来。很快，龙门石刻就以《龙门二十品》为名，成为天下瞩目的书法*，被称为魏碑。

在王羲之的精美劲健之外，魏碑为中国书法注入了豪放质朴。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开创了又一片崭新的空间，很快中国书法史上兴起了碑学的大潮。

北魏石工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们信手凿刻的几个字，后来居然能与“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并列，成了后世难以企及的“经典作品”。东晋法帖和北魏石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并峙的双峰，耀眼的双璧。

这是一个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年代，这是一个汉族联合北方少数民族，在广大富饶地区积极开发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为秦汉帝国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第二个大变动时代魏晋南北朝，思想的解放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以顾恺之为代表的写实画派，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佛像造窟艺术，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永恒经典和世界艺术史上的不朽的瑰宝。

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以雕塑、绘画和书法为代表的艺术迎来了全面繁荣的新阶段，并最终完成了从实用到自觉精神的历史性的跨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为隋唐盛世的到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第六章 七彩长虹

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第二次大变动，北方民族大面积融合，中原文化大量南渐。在这漫长的四百年里，魏晋南北朝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它是一个思想和艺术大丰收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

陈来：这时期士人的精神面貌，首先呈现出比较独特的状态，我们一般叫做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体现在哲学上是追求老庄哲学里面的无，在生活形态上是追求所谓的放。在精神境界上是寻求所谓的达。那么这一切都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他在精神上和自我上的一种觉醒。

王岳川：可以说，在汉代以前的书法基本上是实用的书法，而魏晋时期王羲之代表的书法是艺术的书法，变成了真正的一种艺术，所以人的觉醒，文的觉醒和书法的觉醒，代表了生命的觉醒。

陈少锋：当时在艺术上以自然为最高的标准，就是人能够从自然当中得到的那种启发，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是讲究非常美，非常绚丽，非常灿烂。内在的精神它很灵动，很有自然的这种变化。这种审美就是，当时包括山水诗，很多山水画，它都非常强调这种传神，强调它的那种流畅，强调它的自然的这种意味。

邱振中：晋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非常地动荡，但是中华文明似乎在这里走到了一个它自己的高峰，以前积聚的一些思想感觉，还有艺术上的成就，文化上的成就，在这里头好像汇聚着一个灿烂之点，它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某些基调，精神上的某些主干。比如说潇洒、旷达，关注自己内心的生活，对某些境界的无限地向往等等，都影响到后世的发展和整个后代的精神生活。

李学勤：司马迁写《史记》它是一个通史，是讲中国整个的历史。而这整个历史他选用“五帝本纪”，用炎黄，特别是黄帝的时代，

作为五帝本纪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他不但是根据古书文献，还亲身到全国各地做了调查，了解各地方的历史传说，这样才选择的。那么从《五帝本纪》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黄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

◎武威天梯山

◎魏晋释迦牟尼坐像

◎张掖大佛寺

◎魏晋云冈石窟

王岳川：魏碑和王羲之代表的帖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之所以同时出现是因为魏晋时期是一个隔江而治的时代，所以呢，北边是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以一种大漠苍凉，而且巨石摩崖的方式，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尽管是文字不周，文字不雅，形式也不是像文人那么秀丽，但是它代表了一种雄沉的漠北的风尚。